

## 第五章 西部大開發政策所面臨國際與國內政經之挑戰

### 第一節 國際政治局勢的轉變

中國大陸學者閻學通認為，冷戰結束後，中共週邊安全形成東、西兩大區和東急西緩的特點。中國大陸的經濟和政治重鎮主要集中於東部沿海地區，領土和邊界爭端也集中在此地區，因此東境安全對中國的現代化工作影響很大。至於西部週邊地區則分為西北和西南兩個方向，蘇聯解體後，中共北部和西北邊疆的軍事壓力消失；中共和印度的關係正常化，也使得中共西南方的安全環境得到了改善。<sup>75</sup>

根據閻學通的分析，中共與鄰近西部的周邊國家，安全利益的一致性應高於衝突性。但值得注意的是，由於西部地區存在著民族和宗教的複雜問題，其潛在的危險性也高於中共與美日等國的關係。中共擔心一些「國內外敵對勢力」會利用民族和宗教問題，對中國大陸進行「顛覆」和「分裂」的活動。<sup>76</sup>中共認為：「民族問題往往是由於民族地區經濟落後和其他地區形成巨大反差而造成的心里不平衡所引起的，這又是誘發衝突的導火線。許多地區爆發的戰爭大都是經濟差距激化了民族矛盾所致，一區域之間發展的嚴重不平衡，無疑將影響到民族的團結與國家的統一。」相較之下，西部地區的經濟發展，確實較鄰近的國家落後。因此，大陸學者引用鄧小平的話：「現在，週邊一些國家和地區發展比我們快，如果我們不發展或發展太慢，老百姓一比較就有問題。」<sup>77</sup>如此看來，西部大開發對於維持邊境的穩定

<sup>75</sup> 閻學通，《中國與亞太安全》，（上海：時事出版社，1999年），頁217。

<sup>76</sup> 閻學通，《中國與亞太安全》，（上海：時事出版社，1999年），頁215。

<sup>77</sup> 杜平，《西部大開發戰略若干決策問題》，（北京：中央文獻，2000年），頁78。

和安全，有其重大的作用。

美國在「九一一」恐怖事件遭到攻擊後，國防安全戰略的觸角已經延伸到中亞和南亞鄰近地區，直接進入中共與俄羅斯的「後院」。中共與中亞國家建立安全合作機制，其主要的考慮即是防止美國勢力的介入。但「九一一」恐怖事件發生後，美國透過全球性的反恐活動，已經取得俄羅斯的合作，並且改變了中亞地區的國際關係。中共西部大開發面對這項新的國際因素衝擊，其外交和安全的爭霸權將更為突出，這點恐怕是當初中共制定西部大開發政策所始料未及的。

「九一一」恐怖事件後，由美國主導的反恐國際聯盟，促使美國將保障本土安全和強化全球稱霸戰略結合，不但改變了美國的安全部署，甚至影響了全球戰略佈局。<sup>78</sup>美國藉反恐戰爭擴大打擊面的形勢發展，將對中亞地區及南亞的地緣政治和國際安全格局產生深遠影響。過去在中亞地區居主導地位的俄羅斯，以及意圖在中亞擴大影響力的中共，都對美國軍事勢力介入中亞的發展高度關注。在二〇〇二年一月廿一日第四期「瞭望」週刊刊出「美國撬動中亞地緣政治格局」文章指出<sup>79</sup>：「九一一」事件後，美國赫然發現，中亞不僅是國際恐怖主義的「震中」，而且是美國戰略利益的前沿。以往美國的主要注意力在控制裏海石油天然氣及其管道走向上，關鍵是繞過俄羅斯和伊朗。如今對反恐戰爭來說，擁有中亞空中走廊和地面基地不僅是當務之急，而且勢力是長遠的基礎。中亞在美國全球戰略中的地緣政治地位驟然上升。

---

<sup>78</sup> 朱萸，〈近年來西部大開發發展制約因素初探〉，《蒙藏地區現況雙月報》，（第 11 卷第 2 期），頁 7。

<sup>79</sup> 《瞭望週刊》，（2002 年 1 月 21 日第 4 期），頁 53。

美國在中亞的勢力擴張不但影響中共在該地區的政經、能源安全等利益，更直接衝擊到其國防戰略等利益，中共目前最憂慮的是，美國在中亞地區的駐防將對其產生莫名的「圍堵」作用。北京大學國際安全學者朱鋒即指出：「美國加強中亞駐軍，將使北京對台的戰略優勢受損。」<sup>80</sup>再者，沒有終戰日期的反恐戰爭，以及美軍無限期的駐防中亞與中國大陸邊界附近，將使得西部地區處於不穩定和不確定性的狀態，這些因素可能導致中共經濟現代化的「大戰略」走上岔路，最直接的影響將是「西部大開發」戰略的推動。

## 第二節 世界經濟體系的衝擊

中國大陸已於二〇〇一年年底正式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此舉可視為中共融入世界經濟體系的一個重要里程碑。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對中共而言，能夠再與世界貿易組織的一百四十多個會員體的貿易往來中，享受多邊且永久的最惠國待遇。對西部地區來說，更是一個不可多得的絕佳發展機遇。根據大陸學者的樂觀說法<sup>81</sup>：首先，中國入世將促進西部地區的外貿出口的擴張，為產業調整開拓有利空間，更使西部地區的企業有更多的機會參加國際競爭。當然，在激烈的競爭下將會造成部份企業的倒閉而退出市場，但卻可使優秀的企業脫穎而出，完成地區產業的結構重組。其次，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後取消關稅及非關稅壁壘的舉動，有益於西部地區資源的優化配置，以及產業結構的調整與升級，促進經濟發展。最後，西部企業還可透過世界貿易組織的多邊爭端解決機制，有效的保護其在國際市場上的經濟貿易利益，使西部地區企業能在平等

<sup>80</sup> <北京擔心美國長期駐防中亞>，《聯合報》91年1月16日，13版。

<sup>81</sup> 李萍主編，<西部開發熱點問題探討>，頁45-46。

的條件下，盡最大的努力去爭取發展的有利條件。

相對於上述樂觀的說法，晚近甚至有人認為中共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將引發中共的全面崩潰。<sup>82</sup>整體來說，中共的入世對其自身的發展帶來了前所未有的挑戰，其國內政治經濟及社會發展將會受到很大的影響，甚至有人用「衝擊」( impacts ) 來說明中共入世後的處境。加入 WTO 對中共來說，最直接的衝擊就是產業發展的問題。一般的看法是認為短期間其農業部門和服務業部門為輸家，而勞力密集部門為未來的贏家。也就是說，勞力密集產業方面仍具有優勢，而在資本、耕地與技術密集產業則不具競爭優勢，所以可以預期中共入世後其勞力密集產業部門會擴張，在國際市場上的份額會增加，而在資本、技術與耕地密集使用產業的方面則可能會仰賴進口。<sup>83</sup>

根據中國大陸「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所做的研究指出，雖然貿易自由化帶來整體福利的增加，但是期間並未包含利益平均分配的機制，農民階級與工商階級之間的所得分配惡化，加上農業受衝擊後的就業調整問題，農業部門的衝擊將對中國大陸的社會穩定帶來許多的挑戰。經濟轉型所必然出現的結構性失業人口將增加中共在社會支出上的財政負擔。因此，許多學者推估，伴隨著中共入世，這些龐大的失業人口若無法做有效的安置，將成為社會安定的一大隱憂，這對中共的經濟現代化目標將造成極大的衝擊。<sup>84</sup>

---

<sup>82</sup> Golden G. Chang, 侯思嘉、閻紀宇譯,《中國即將崩潰》,(台北:雅言文化,2002年,第9章)。

<sup>83</sup> 吳啟禎,〈中國大陸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之宏觀分析〉,(台南:國立成功大學政經研究所碩士論文,2000年),頁25。

<sup>84</sup> Joseph Fewsmith,〈The Political and Social Implications of China's Accession to the WTO〉,The China Quarterly, No.16 (December,2001),pp.576-580.

中共加入 WTO 後，西部地區首先受到衝擊的是農業、零售業、汽車、石油化工、電力、鋼鐵工業等，這些傳統農業與重工業均因降低進口關稅和開放進口配額，隨著外國企業搶占大陸市場，而加劇市場競爭，進而會影響價格的復甦，尤其是面對激烈的國際市場競爭，將會導致大批國有企業破產，從而減少工業用電需求，對西部已經供過於求的能源市場無異是雪上加霜。<sup>85</sup>此外，隨著關稅的降低，非關稅措施如配額管理的大幅度減少，一部分跨國公司有可能不再採取投資方式進入中國，改採以貿易形式，把產品賣到中國。且按照 WTO 的規則，各國政府不能以轉讓技術、國產化、出口比例等作為批准投資的條件，對於通過利用外資引進技術不利。在現行法規尚未健全，人才素質仍低落的西部地區，加入 WTO 後將對此地區可能造成盲目投資、管理混亂等問題，如此不利的條件將影響西部地區的開發。

因此，西部地區的發展作為中共加入 WTO 的整體考量之一環，在中共中央努力於各項入世的準備活動之前，西部地區的相關配套措施之不足實乃一大隱憂，放眼中國入世後將可為西部地區帶來的發展利基與經濟衝擊，西部地區的制度創新和改良都是急須解決的問題。

### 第三節 中共政權穩定的考驗

單純就西部開發的政治意義而論，中國大陸的學者曾從不同的角度進行闡述。其中最主要的觀點是強調地區發展差距對政治社會穩定產生的不利影響，例如，胡鞍鋼教授的問卷調查表明，有 84% 的人認為地區差距過大「將導致社會不穩定」；有 16% 的人認為可能會出現

---

<sup>85</sup> 胡鞍剛主編，〈中國走向〉，（浙江：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 年），頁 357-358。

「國家分裂」。因此，胡鞍鋼指出：「解決日益擴大的地區差距問題，不僅要從經濟增長的角度觀察問題，而且還要從政治穩定和社會穩定的角度觀察問題。」<sup>86</sup>

另外，也有研究者是從地理位置的不同特點，分析西部開發的政治意義。他們認為西部地區是中國少數民族居住比較集中的地區，中國境內五十五個少數民族的大部分據居於西部，全國民族自治地區總面積 616 萬平方公里，西部十個省區佔有 96.6%；陸地邊境 22000 公里，有 90%在西部。因此，從現實和歷史的經驗教訓來看，發展和穩定西部地區對解決民族團結、宗教平穩與國家的穩定具有積極重要的貢獻。特別是九 0 年代以來，隨著世界民族主義浪潮的氾濫，蘇聯的解體和東歐的巨變，民族分離主義的浪潮對民族關係的衝擊很大，西部開發中，對這些問題必須給予考慮。<sup>87</sup>因此我們可知民族問題尤將在西部大開發的難度上增加一些變數，因為任何現代化的建構過程多少都會帶來反現代化的浪潮，更多的時候是表現在「文化民族」方面，而文化的差異極有可能轉變成政治問題。在西部大開發中，出現的民族問題大多應是中國境內長期已存在的民族問題之延續，因此，就其屬性與內容而言，應不至於因西部開發而發生極大變化，但在原有的問題上是否因開發工作而造成其消長現象，則值得注意觀察。

就西部大開發對民族關係的影響而言，從積極面來看，隨著西部大開發重點工作的實施，若西部民族地區的基礎建設、生態環境保護意識提高將會逐步改觀，經濟和社會各項事業的發展亦會加快，各民

---

<sup>86</sup> 胡鞍剛、王紹光、康曉光編著，〈中國地區差距報告〉，頁 12。

<sup>87</sup> 劉徐波、高興國，〈西部大開發戰略研究縱述〉，《甘肅社會科學》，(2000 年第 1 期)，頁 39。

族的人民生活水平、生活品質以及生活環境都將有顯著改善的情況下，則妨礙民族關係正常發展的不利因素是會受到控制，對於民族和諧、民族團結的增進，以及社會穩定會起積極的正面作用。如前所述，經濟發展與社會進步是增強民族團結的基礎，民族團結是促進經濟發展與社會進步的保障，因此，團結與發展是相輔相成的。

但若從西部大開發的過程中可能產生的困難問題來思考，則呈現的是另一番景象。短期內東西差距依然存在，西部地區內部的貧富差距拉大，經濟利益競爭與分配得矛盾，外來人口造成的壓力與摩擦，開發造成生態的壓力，傳統與現代化的衝擊，民族意識高漲造成的動亂等等問題，皆將使西部開發中的民族問題更趨複雜。因此，即使西部開發視為民族社會的發展，也替民族問題的解決提供難得的機遇，但同時亦置少數民族社會於社會震盪的痛苦現實中，民族問題的形勢依然未必絕對性樂觀。

不論西部大開發對於西部少數民族及民族地區的影響是正面或負面，但可以肯定的是，對於解決民族問題必然有深遠的影響。為了使西部大開發的各項計劃能順利進行，預料中國大陸未來對於民族地區的統戰工作能將持續並更加強。例如：2002年初，中共釋放了34歲的西藏音樂學人阿旺錯培（Ngawang ChoepheI）；已監禁30多年的政治犯達納久美松保在2002年4月初提早9年出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國政協主席李瑞環2002年2月接見11世班禪，班禪還在雍和宮主持一項灌頂法會。中共對西藏的示好，當含有其弦外之音<sup>88</sup>。

---

<sup>88</sup> 宋國誠、王瑞琦等編著，〈21世紀中國：西部大開發〉，（台北市：政大國際關係研究中心，2001年），頁389。

無論從地區發展差距，或是從民族問題的角度分析，大陸學者對西部開發政治意義，幾乎都強調穩定的概念。大陸學者劉吉認為，穩定是必要的前提，在某些情況下(如社會矛盾尖銳時)「穩定高於一切」，沒有穩定，什麼改革，什麼發展都是空話。

在談到西部大開發的理論淵源時，中共學者最常引用的是鄧小平的「兩個大局」<sup>89</sup>戰略思想和「共同富裕」<sup>90</sup>思想。鄧小平認為：「要實行鼓勵一部分地區、一部份人通過誠實和合法經營先富起來的政策，提倡先富帶動和幫助後富，逐步實現共同富裕。」<sup>91</sup>為了落實上述鄧小平的理論，中共中央自八十年代開始，即對東部地區投下大量資源，並提供各項優惠政策。相對的，西部地區因資金和人才的短缺，發展明顯落後，出現了與東部地區之間的嚴重差距。如果中共聽任這樣的差距擴大，則不僅鄧小平的個人魅力會受到影響，共產黨的權威合法性與正當性也將受到質疑。因此第三代中共領導人江澤民提出西部大開發政策，從政策面來看，中共推動西部大開發計畫，有助於加強中共中央的領導權威，幫助中共解決西方學者所說的政治危機。

西部地區是中國大陸少數民族較為集中的地區，因此，西部大開發的重點，就是民族地區的發展。江澤民曾指出：「沒有民族地區的穩定，就沒有全國的穩定，沒有民族地區的小康，就沒有全國的小康，

---

<sup>89</sup> 一個大局就是「沿海地區要加速對外開放，使這個擁有兩億人口的廣大地區發展起來，從而帶動內地更好的發展，中西部地區要顧全這個大局。」另一個大局就是「當東部沿海地區發展到一個時候，又要求沿海地區拿出更多的力量來幫助內地發展，東部地區也要順從這個大局。」

<sup>90</sup> 鄧小平認為：「社會主義的本質，是解放生產力，發產生產力，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最終實現共同富裕。」

<sup>91</sup> 摘錄自〈鄧小平文選，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頁237。



沒有民族地區的現代化，就沒有全國的現代化。」<sup>92</sup>中共是多民族國家，一般認為，這樣的國家往往比單一民族國家難以控制或整合。西方學者即認為「從中央政府領導精英的觀點來看，多民族常構成一項難題或阻力，從未成為一個機會或助力。」<sup>93</sup>

同樣屬於多民族國家，前蘇聯的經驗提供了中共一個負面的教材，也許中國大陸和蘇聯的情況不同，但中共領導人仍然不斷地提醒各級幹部要記取教訓。中共自建政以來，其對少數民族提出系列的優惠政策，確實在這些地區產生了穩定和推動政經發展的效果。但隨著改革開放政策的實施，中國大陸由社會主義經濟進入市場主義經濟的時代，這些民族優惠政策反而失效和滯後了。

「西部大開發」政策是一個「集民族、經濟和體制等三位一體的載體，表現出其三者時空上的統一。」因為，首先西部地區是民族最集中的地區，故具有民族性；其次，西部大開發本身就是一個經濟行為，意味著中國大陸區域經濟非均衡發展空間佈局的調整和發展重心的西移；其三，由於中共目前的經濟體制改革是以建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框架為目標，在西部大開發的整個過程中，必須引入市場機制，做到資源配置的市場化。<sup>94</sup>由此可見，西部大開發的整體進程若發展成政策失效，勢將造成中共於民族問題上的惡化與中央領導權威的動搖。

---

<sup>92</sup> 江澤民在中央民族工作會議暨國務院第三次全國民族進步表彰會上的講話。《人民日報》，(1999年9月30日)。

<sup>93</sup> Joseph Rothschild, *Ethnopolitics: A Conceptual Framework* (NEW YORK, N.Y.: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1), p.213.

<sup>94</sup> 崔成男，〈西部發展機制研究〉，《四川：四川人民出版社》，(2001年，頁48-49)。

二 二年是中共政府換屆，領導人世代交替的重要時刻。從權力轉移的觀點來看，西部大開發的落實，不僅將理所當然地成為中共第四代領導人的當務之急，甚至會是影響未來權力穩定的一個政策課題。中共十六大已經結束，胡錦濤已確定為第四代領導人，胡的權位是來自於鄧小平的隔代欽定，他繼承了鄧小平和江澤民所留下的政治資產，但附帶的也是他們的政治責任。西部大開發就是其中一個重要的政策任務，處理不當，勢將遭到批評，並且危及權力鞏固的過程。一般認為，胡錦濤再執行西部大開發的計畫時，有他與眾不同的條件。一九八五年至一九九二年期間，胡先後擔任貴州、西藏書記，有處理少數民族的經驗。胡接替江澤民職位之後，可望提升適量的少數民族進入中央服務，製造「民族團結」的形象。<sup>95</sup>「西部大開發」未來在胡錦濤手裡將怎麼走，我們無法多談，僅可知這是中共第四代領導人的一大挑戰。

#### 第四節 國內經濟市場的不均衡發展

在傳統的計畫性經濟體制之下，人財物的高度集中，國家具有超強的資源動員能力和效率。“一五”重點在西北和“三線建設”重點在西南時期的兩次西部開發，迅速奠定了西部地區的工業化基礎。然而，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轉型之後，資源配置的主體轉向市場，市場調節顯然不利生產要素的「西進」。沿海地區發展戰略的成功在於國家實施了「順市場調節」的機制，而西部大開發戰略則是國家採取「逆市場調節」，即是在市場經濟導向中，由國家發揮政府干預的作用，以注入資金和制定政策，來協助西部發展經濟，以發展中國家的政

---

<sup>95</sup> 趙春山、楊開煌，〈中國西部大開發之綜合評估：西北部分〉，《行政院大陸委員會之專案報告》，(2002年)，頁81。

府，進行這種「逆市場調節」的操作，計畫目標能否實現，仍存在很大的變數。<sup>96</sup>

自中共實施經濟改革以來，中國大陸總體經濟已經告別短缺時代，反而是製造業生產能力過剩，商品市場供過於求的趨勢愈為明顯，一九七八年至一九九七年之間，中國工業生產能力空前提高，工業附加值增長了七點六倍，一九七八年工業部門淨資產有兩千多億元人民幣，到了一九九七年上升為四萬億人民幣，據「國際先驅論壇報」認為在發展中國家，中國在生產力過剩排行榜上居首位，幾乎所有的商品都遠大過於需求。大多數工業企業獲取高利潤的條件不復存在，特別是傳統工業已進入低利或微利時代，製造業生產過剩問題是多年來行業間過度投資、重複建設、惡性競爭所造成的結果，現存經濟結構既不適應國內市場需求，也不能適應國際市場競爭挑戰。<sup>97</sup>

經過了十餘年來的大規模經濟建設，目前中共沿海地區的投資環境已經日趨完善，自我發展能力逐步增強，隨著改革開放的全面推進，經濟技術基礎雄厚且重工業基礎較好的渤海灣岸地區正出現良好的發展勢頭，大陸沿海地區全面進入高速增長的時期，相對的，西部地區加快經濟發展的內外環境短期內很難有所改變，就其經濟體制來看，東部地區設立經濟特區，實際上是整個國家在計畫經濟體制之外試行經濟體制，東部地區在區域內開始按照市場機制原則來配置資源，也就是說，東部沿海地區開發之初，同時享受了計畫經濟和市場經濟的雙重好處。目前，中國大陸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框架已經確立，

---

<sup>96</sup> 陳耀，〈西部開發大戰略與新思想〉，《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2000年），頁3。

<sup>97</sup> 胡鞍剛主編，〈中國走向〉，《浙江：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頁18。

西部開發所需的資金發生根本變化，大部分的資金已由過去無償變成有償獲得，唯有西部能創造更多的利潤，其他資金才有可能流入，否則資金會發生逆流。儘管短期內中共中央會加大西部財政投入，但從長期來看，西部開發更主要的投資，包括國內與國外投資，這些投資是按照市場經濟原則流動和配置的，目的在於追求更高的投資報酬。此外，要求實施比東部更為特殊優惠的政策亦不可行，因為全面開放下，大陸許多地方都比照經濟特區的做法實行優惠政策，即便中共中央把經濟特區的各項優惠政策權給西部地區，也談不上傾斜政策，換言之，誰享受這優惠政策等同於誰不享受這優惠政策，因此加速西部開發政策的支持空間不是很大。

目前，西部地區仍屬於工業化的初期階段。據統計西部十省市區人均 GDP 約合四百多美元，工業化程度低於全國平均水平五至六個百分點，一九九八年西部地區國內生產總值為一萬一千五百五十二億元，僅佔全國的百分之十四，<sup>98</sup>與全國百分之五七的國土面積和百分之二十三的人口比例很不相稱。未來繼續推動西部地區工業化面臨的最大矛盾，就是如何將定位內需市場為主的西部地區產品銷售出去，推動西部地區工業化面臨的將是市場容納問題，西部地區在市場經濟的起跑點上已經遠居劣勢的情勢下，如何確定及選擇化的問題，攸關西部地區未來的發展。

過去東部地區發展面對的是經濟短缺，開發產品、發展生產、投資項目，基本上是短線定位，有一個廣闊的增長空間。現在西部開發面臨的卻是外需拉動劇減，內需增長緩慢，通貨緊縮的經濟環境。此

---

<sup>98</sup> 參照陳義平，〈西部開發存在人口問題嗎〉，《人口研究》，第 24 卷第 4 期，(2000 年 7 月)，頁 52-53。

外，在國內市場國際化與國際市場國內化的競爭前提下，西部地區同時面對其國內二十多萬家三資企業在國內競爭和國內廠商在出口市場的競爭，西部開發的前景可謂是相當艱難的。

## 第五節 小結

本章是以西部大開發政策所面臨的四項挑戰為內容，分別是國際政治局勢的轉變、加入 WTO 的衝擊、中共政權的穩定以及中共經濟市場的改革。

在國際政治局勢方面，首先當是九一一之後，美國藉反恐戰爭勢力進入中亞地區。美國在中亞的勢力擴張不但影響中共在該地區的政經、能源安全等利益，更直接衝擊到其國防戰略等利益，中共目前最憂慮的是，美國在中亞地區的駐防將對其產生莫名的「圍堵」作用。美軍無限期的駐防中亞與中國大陸邊界附近，將使得大陸西部地區處於不穩定和不確定性的狀態，這些因素可能導致中共經濟現代化的「大戰略」走上岔路，最直接的影響將是「西部大開發」戰略的推動。

在世界經濟體系方面，加入 WTO 對中共來說，最直接的衝擊就是產業發展的問題。短期間內農業和服務業將承受部分損失，而勞力密集產業為得利者。所以可以預期中共入世後勞力密集產業部門會擴張，在國際市場上的份額會增加，而在資本、技術與耕地密集使用產業則可能會仰賴進口。入世對中共經濟與社會的另一重要衝擊，是經濟轉型所必然出現的結構性失業人口。下崗的失業人潮能否得到中共有效的控制，不受入世後經濟轉型衝擊而更加惡化，將會是中共政權

能否穩定的一項重要因素。

在政權穩定考驗方面，追求穩定是中共現階段對政治、經濟、外交、社會、民族的大方針。上文已提到「西部大開發」政策是一個「集民族、經濟和體制等三位一體的載體，表現出其三者在時空上的統一」。承接「西部大開發」政策對中共第四代領導人而言，不僅是政治穩定、政策延續的政治作為，也是藉由經濟發展、生活提昇的手段企圖將經濟、民族、社會的問題得到相當程度的紓解。

最後是國內經濟市場方面，本章認為「西部大開發」屬於「逆市場調節」的操作模式。其本質上是在市場經濟導向中，由國家發揮政府干預的作用，注入資金和制定政策，來協助西部發展經濟。以現階段仍舊處於發展中國家的政府效能，進行這種龐大、複雜的「逆市場調節」政策操作，計畫目標能否實現，仍存在很大的變數。

以政治調節協助市場調節觀點來看，中國大陸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框架已經確立，西部開發所需的資金發生根本變化，唯有西部能創造更多的利潤，其他資金才有可能流入。儘管短期內中共中央會加大西部財政投入，但從長期來看，西部開發更主要的投資是按照市場經濟原則流動和配置的，目的在於追求更高的投資報酬。此外，政治調節的另一措施，實施比東部更為特殊優惠的政策亦不可行，因為全面開放下，大陸許多地方都比照經濟特區的做法實行優惠政策，即便中共中央把經濟特區的各项優惠政策權給西部地區，也談不上向西部傾斜的政策。因此整體來說，在人為的政治調節與自然的市場調節中，西部開發政策的支持空間必須要更審慎看待。

